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侮,民不聊生,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始终在寻求救国图强之路。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浙江诸暨人)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的裹挟下,曾尝试了一条“实业救国”的探索之路。

赵忠尧与“长城牌”铅笔

◎两浙人物 □周明



1931年底,赵忠尧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成(获物理学博士)归国,即被清华大学聘任为物理系教授,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国家与民族危亡的情势,已经容纳不下三尺讲台,实验室里的那些精密仪器,在风云变幻的洪流中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而笼罩在天空中的硝烟与乌云,带给赵忠尧等爱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苦闷与焦虑。赵忠尧在晚年的回忆文字中,写出了当年内心的煎熬:“除科研教学外,我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我曾尝试了多种途径: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等。但由于个人出身及身体等条件的限制,所选择的多为改良的道路,始终未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与付出的努力相比,收效甚微。尽管碰了不少钉子,但毕竟身体力行,尽了努力,从各个方向试着去做一点于国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

为此,赵忠尧走出校园,考察社会。暑假期间,他与清华大学的同事赴河北定县,考察教育家晏阳初利用国外捐助而建立的平民教育实验点。考察过程中,赵忠尧详尽而诚恳地询问了平民教育的现状与前途。据段希文等著的《核物理先驱——赵忠尧》载:“赵忠尧基于为国家做点事,参观时很诚恳地问道:‘定县是模范县,养良种猪,农民收入增加,身体也好,

不过我的二个问题:定县搞平民教育的钱是外国捐助的,如果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搞行不行?定县搞成模范县,能否带动起旁的县也这样搞?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是如果需要,我也愿意去办平民教育。’但是得到的回答是:这大概都办不到!不过,提倡者希望他不要失望,告诉他:‘我们做试验,想找出一种使中国很快强盛起来的办法,等到有了好的政府来赞助,就可以很快搞好。’赵忠尧听了,说道:‘要是这样,我就不去搞了。如果有很好的政府,科学也可以搞,工业也可以搞,不一定去搞平民教育。’”

定县之行让赵忠尧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教育救国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只好尝试实业救国,而兴办铅笔厂,也是自定县考察以后下的决心。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抱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我又想结合出国数年积累的经验,在国内仅有的少数企业中寻觅伙伴,探索技术,创办小型的国产工业……我利用暑假去定县参观,既了解到中国农村的贫穷困苦,又看到那里缺少文化,急待改造。虽然这种投入很局限,但我触动很大。对我以后参加办铅笔厂,替国家采购仪器、部件,加工设计等都是有帮助的。我去做这些事,都是经过考虑的,都是克服了困难,尽力去办好的。”

当时,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即使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产品也需要从国外购入铅芯等半成品,然后在国内加工成成品。据《核物理先驱——赵忠尧》载:“经过反复酝酿,他(赵忠尧)拿出自己工资的积蓄,又在朋友中征集了一些资金,联合叶企孙教授和施汝为、张大煜等少数友人,创办了一个小小的铅笔厂。”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物理的奠基人,一代宗师,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并理学院院长。

赵忠尧以为,“建铅笔厂所需技术与投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此作为从事实际生产,为国出力起点。”秀才办实业,凭着一腔爱国情怀,不以营利为目的,“小则可以发展实用科学,大则创办国产工业……由于当时国难当头,大家义愤填膺,这个厂得以在困难中办起来,全由大家的爱国热情所支持。”在世界物理界享有声誉的物理学家,教育之余,竟投入到了研究铅笔的制造与开发之中,以期实现从笔芯制作到成品完成的全过程。“我们力求在国内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赵忠尧语)

机器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花去了赵忠尧省吃俭用的积蓄。对此,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在《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忆父亲赵忠尧》一文中留有记述:“看了光明日报刊登赵启正先生等所著《一位与诺贝

尔物理奖失之交臂的人》一文,又引起了我对父亲赵忠尧的深深思念。我把父亲的论文选集放在书桌上,望着父亲年轻时的相片,陷入沉思。父亲曾有过怎样的理想、抱负?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业救国’,他把在国外读书节省下来的钱在德国买了一台铅芯机带回上海,制造出了我国的长城牌铅笔。”

其间,赵忠尧还亲自参加铅笔制造的相关工艺实验,物理学家的实验室经验具有国际前沿的水准,即使做的不是物理实验。“除从国外购进必要的机器设备外。我还与郭子明等几位技工进行削木头、制铅芯等必须的工艺实验,先后经历了不少困难。”(赵忠尧语)

铅笔厂原本考虑建在北平,但因为日寇的铁路已经践踏到了长城脚下,战争全面爆发已经不可避免,于是,赵忠尧等将铅笔厂建在上海。而以“长城”命名的厂名和品牌,也充分说明了赵忠尧等科学家的爱国情怀。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后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只得改建在上海。厂名定为‘长城铅笔厂’,‘长城牌’铅笔由此问世。”

铅笔厂自创办开始便步履维艰,资金缺乏是一大问题,管理者先是在北平,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举校南下,与北大、南开等落脚云南昆明,而生产厂区在上海,疏于管理显而易见,在那期间,还经历了一场火灾,几近倒闭。后来,因为有利可图,便有了股东的加入,才在战争的夹缝中支撑了下来。据《核物理先驱——赵忠尧》载:“有几个资本家见这个行业还有利可图,于是建议由他们投资合股经营。从此,工厂主要交给他们去办了,赵忠尧才如释重负。”对此,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一文中也写到了这一段经历:“由于资金薄弱,缺乏管理经验,加上政局动荡,我们又远在北京或西南内地,对于具体管理鞭长莫及,真是难上加难。工厂几经盛衰起落,能度过抗战,一直坚持到胜利,实在不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赵忠尧等创办的“长城铅笔厂”实行了公私合营,企业获得了新生。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解放后,这个厂改建成‘中国铅笔厂’,五十年代,‘长城牌’铅笔改名为‘中华牌’,工厂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样,三十年代开始生产的‘长城牌’铅笔总算没有中途夭折。”

赵忠尧与“长城牌铅笔”的这段往事已经消散在浩渺的历史烟云之中,无法挥去的是,当年赵忠尧等爱国科学家在国难之际,挺身而出,报国图强的那份拳拳之心。时光流转,情怀依旧。

◎史林偶拾

梅贻琦巧解棘手事

□姚秦川

1937年,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翌年初,梅贻琦开始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天,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找到梅贻琦,告诉他自己的孩子因考试发挥不如人意,没能考取联大附中,他想拜托梅贻琦出面,向联大附中校长说个情,让自己的孩子走后门入学。

龙云觉得,自己这个小小的要求,对梅贻琦来说不算一件太麻烦的事情。退一步说,当初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办学时,他曾在人力物力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一点梅贻琦当然也十分清楚。现在自己有所求于他,相信梅贻琦不会拒绝的。

面对龙云的要求,梅贻琦心里也明白,如果自己不给对方帮忙,一定会落个“忘恩负义”的名声;可如果自己去求人走后门,又不符合

自己一贯的办事风格。思付了一会儿,梅贻琦计上心来,他一面热情地挽留龙在家吃晚饭,一面派人去学校,将教务长潘光旦叫过来作陪。

吃饭的间隙,梅贻琦对潘光旦说道:“龙主席的孩子这次考试没有考好,你晚上能不能抽出时间,帮孩子好好辅导一下,争取明年考取理想的学校。”听了梅贻琦的提议后,潘光旦满口答应下来,并开玩笑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龙主席的期望。听了梅贻琦的话,龙云心里明白,对方已经婉拒了自己想走后门的要求,当着潘光旦的面,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未了,梅贻琦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表情严肃地说道:“不过请家教的费用,必须由龙云支付,这一点可马虎不得。”龙云也顺口附和当然没有问题。

一件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被梅贻琦巧妙地化解了,同时又没有让龙云过于难堪,这种睿智和办事能力,令人为之佩服。

蔡君谟的拒绝

□唐宝民

蔡君谟(蔡襄)是北宋仁宗时期的文人,以书画见长,曾经多次奉命为皇上书写。按理说,能够奉命为皇上书写,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许多人求之不得,然而,蔡君谟却不这样看,对于皇上所下的指示,有的他听从了,有一些则拒绝掉了。这是为什么呢?

蔡君谟死后,欧阳修为他做了一篇《蔡君谟墓志》,这篇墓志被收入到了北宋史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墓志中这样提到,蔡公在书画方面颇为见长,但从从不随便给人写字画画。宋仁宗皇帝特别喜欢他的书画,御制的《元舅陇西王碑文》,专门指示让蔡襄书写。不久以后又命令学士撰写了《温成皇后碑文》,又指示蔡襄书写,可他坚持不肯,说:“这是待诏的职责。”

通过这段话的意思,我们能够知道,蔡君

季羨林第一次碰钉子

□张达明

1936年,季羨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列文。在读完第四个学期后要撰写毕业论文,踌躇满志的季羨林查阅了大量资料,点灯熬油好不容易完成了整篇文章,并自认为是叫得响的“大手笔”,随即交给了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出乎季羨林的意料,一个星期后,导师将文章退了回来。季羨林仔细看过,导师竟没有改一个字,而是在文章第一行第一个字的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这就意味着,全文被教授两个小小的括号给否定了,季羨林很不服气,当即去找导师“要说法”。在听完他的陈述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紧不慢地说:“我看出来

了,这篇文章确实花费了很大精力,尤其引用了大量资料,但通篇文章没有你自己的见解,几乎原文照抄了资料,这样的文章无任何价值。如果有人当面挑剔这篇文章,你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建议你把绪论全部删掉,用你的所学把观点表达出来就行了。”

导师的话犹如当头一棒,让季羨林清醒的同时,也让他羞愧难当,又老老实实按教授要求重新写了一篇观点新颖的论文,受到了好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季羨林已是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但对此事仍记忆犹新,每每谈起,总是感慨不已:“这是我碰的第一个钉子,然而我很感激导师的这一头棒喝,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郭沫若解释“雕胡饭”

□缪士毅

唐代诗人李白撰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诗,其中有“跳进雕胡饭,月光照素盘”之句。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若是这样解释“跳进雕胡饭”的:古人席地而坐,坐取跪的形式。打盘脚坐叫“胡坐”,是外来的坐法。客人既跪坐,故进饭

的女主人也采取“跪进”的形式。(见《李白与杜甫》)郭老解释李白的这一诗句时,将“雕胡饭”说成吃饭的姿势却闹出了一个笑话,被后人传为雅谈。其实,所谓“雕胡”,就是菰米,即菰的种子,为“六谷”之一。菰是盛产于我国南方的水生植物,用菰米所煮的饭在唐代称为“雕胡饭”,是唐代招待贵宾的美味食品。

蒋介石年终发红包

◎史海钩沉 □李健

旧时春节,工厂停工,商店打烊,老板都要提前请员工吃年夜饭,以酬谢大家一年来的劳作,饭后还人手一个红包,里面的钱多少不等,相当于今天的年终奖吧。提倡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也未能免俗,逢年过节都会给侍从室人手一个红包。某年,因漏掉了某组长的红包,后果很严重。

抗战中期,戴笠、徐恩曾的特务势力过度发展及他们自身的政治野心,使蒋介石大为头痛与担忧,认为如不及时加以抑制后果不堪设想。基于此,他发动了一场抑制“两统”势力的活动,最初的打击对象是以戴笠的军统为主要目标,中统只不过陪衬而已。1942年4月23日,老蒋下令由侍从室分管情报的第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并要求其常去局本部视察,随时核实呈报上来的情报是否真实可靠。唐纵对军统初步调查后给老蒋打的报告说,从1932年成立时的特务处145人,军统已发展到在编人员24575人,每月经费开支高达1487万元。然而,军统呈报给侍从室的情报却逐年减少,以今年为例,全年呈报的情报每十个人平均只有2件,相当于每件情报国家要付出13000多元的代价。老蒋阅后

对军统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戴笠接连挨训不说,还处处受制,心情十分烦闷。

戴笠揣摸老蒋的心思,之所以要抑制军统势力,一方面是自己手中的特工队伍日益强大,逐步发展成为高层难以放心的“异己”力量,所谓权高震主;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军统的特务活动过于强势招摇,得罪了不少人,招来党内外各派势力的攻讦,树大招风啊。面对危机四伏的险恶局面,戴笠沉着应对,以退为进,三管齐下,蓄势待发。他首先在军统内部开展大规模的纪律整顿,改变军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恶劣形象;同时尽可能缓和与方方面面的关系,化敌为友,求得谅解;最重要的是加快与美国海军的情报合作,中美合作所做出成绩,得到美军方的赏识,使老头子眼中的形象果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让戴笠从这场打击特务势力的活动中摆脱出来,关键还是唐纵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两人携手合作,从而形成形势最终出现了难以置信的逆转。

唐纵之所以能得到老蒋的信任 and 器重,除了忠心耿耿、踏实肯干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戴笠先从经济上手,让军统局的会计给新任帮办送

来5、6、7三个月的车马费,唐纵为了避嫌断然拒收。在经济凋零、物价飞涨的重庆,唐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当家人得知其拒收几乎相当于月薪的额外收入时,难免招来抱怨与牢骚。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唐纵从掌管侍从室财务的总务处长陈希曾那里得知,老蒋过年时给侍从室人员都发了红包,主任级别的10000~20000元不等,组长3000~5000元不等,唯独漏掉了唐纵。虽然他嘴上说:“予夺操于委座之手,有无私如浮云。孔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敢也。”心中却五味杂陈,不可言状。谁料想,中秋节老蒋按例给属下发红包时,偏又漏掉了唐纵,而其手下六组的秘书则人手一份。年终红包可能是一时的疏忽,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就不是疏漏了,很有可能是老蒋风闻戴笠在给他送钱,有意而为之。尽管唐纵表面上依然没流露出,心中却翻江倒海醋意大发,他在日记中大发牢骚:“自惭才能浅薄,所以年节犒赏独不及我。论成绩自问不下于人,或者启示今后之方针,不在职务上成绩,而在职务之外而乎?”就在唐纵伤感、失落与沮丧之际,消息灵通的戴笠让人及时送上8、9月份的车马费共计1600元。老蒋的薄情寡义赏罚不明,让原本犹豫不决的唐纵想通了,不再矫情自饰故作清

高,心安理得地收下这笔钱,内心对戴笠油然而生一种感激之情。

老蒋驭下的手段是恩威并施,反复无常,让人琢磨不透。第二年的春节,他让陈希曾给唐纵送来5000元的红包,而听说其他组长都是2000元,前后反差之大令唐纵困惑不解。不过戴局长更是出手不凡,车马费由原先的800元一下子提高到每月2000元,春节红包出手就是20000元。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是否应该接受,我的确思虑良久。假如不接,会不会使其对我产生怀疑,觉得彼此间有什么误会,甚至于衔恨我也未可知。”既然已收人钱财同流合污了,还厚颜无耻地编造理由,试图自圆其说,实在是书生耻辱。

如果说戴笠仅靠金钱的力量就打破了唐纵在中、军统之间的平衡,那未必太低估他了。戴笠深谙世故人心,有一套驾驭人的手段,他对唐纵是金钱收买与威胁利诱、恫吓打击多管齐下,使其如履薄冰,权衡利弊,由打击军统的急先锋转到持守势观望,再逐渐倾向于军统,最后与戴笠携起手来里应外合,使形势发生大逆转,把老蒋对特务势力的恶感引向中统方面,导致老对手徐恩曾最终落得“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悲惨下场。



工人兄弟的王大哥

平湖县(现平湖市)黄山乡农民王云生(左一),年轻时长期在农村工作,他勤奋工作,认真学习,积极为农民兄弟服务,受到当地农民的称赞。1989年,他调到乍浦镇二轻工业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坚持和工人兄弟打成一片,和他们同劳动、同学习,工友们热情称他王大哥……

徐永辉摄于1988年11月